

王平政治思想工作二三事

陈军

王平将军自参加革命以来,从普通宣传员干起,直到兵团政委、大军区政委、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等职。在近70年的戎马生涯中,不仅参与组织指挥了许多有名的战役,更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影响至深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典范例。

阜平聚力,组建抗日武装

1937年9月,王平从五台来到河北阜平,与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会合。参与开辟、建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王平把筹建“阜平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作为工作突破点。到达的第二天,王平就去找国民党阜平县长张仲孚商谈筹集经费事宜,遭到回绝。王平向张仲孚耐心说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同时正告他,阜平的“后援会”必须改组为“动委会”,还要“动员人民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组织武装共同对敌”。经过说服教育,张仲孚表示愿意支持筹建“动委会”。

10月初,“动委会”成立,王平任主任,张仲孚任副主任。在王平的领导下,“动委会”派出工作队到各区、村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各区、乡都相继建起“动委会”。多地出现开明士绅捐粮、妇女捐金银首饰的动人场景。一位老人步行25余公里,把他收藏的2支德造驳壳枪和4口袋各式各样的子弹倒在王平的炕上,使王平非常感动。

面对阜平火红的抗日局势,一些国民党顽固派从中作梗。王平针锋相对,以“动委会”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并请张仲孚亲临“指导”。会上,王平列举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等大量事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受群众欢迎。当晚,就有大批青年加入抗日义勇军。

10月10日,日军侵占了石家庄,张仲孚迫不及待地要逃跑。为了防止他把保安队拉走,王平主动找保安队副队长等人谈心,耐心做他的工作,终于成功让保安队留在县中,参加抗日。

在王平的领导下,阜平县抗日武装不断扩大。到10月底,全县抗日义勇军发展到4000人。为给抗日武装筹集经费,王平又召集全县士绅开会。会上,王平用八路军骑兵营在曲阳打日军兵站时缴获的罐头、饼干和香烟招待士绅。士绅们很高兴,边吃边议论。王平顺势向大家解释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向他们介绍义勇军发展的情况。此举不仅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更大大调动了士绅支援前线的积极性。在王平的感召下,士绅们当场就认捐了4万余元法币,解决了抗日义勇军服装给养等当务之急。

刘飞巧设“口袋阵”

贾晓明

1945年4月,苏中军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迎来抗日大反攻的新形势。日军苦于兵力不足,为了阻止苏中军民的战略反攻,命令盘踞在宝应县城的伪苏北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马佑铭部,调往兴化以南的周庄驻防。4月20日,打入敌人内部的新四军敌工人员将这一情报向十八旅旅长刘飞进行了汇报。刘飞等人对敌情做了研究后,认为可以在敌调防途中将其歼灭,并迅速将这一方案向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委陈丕显作了汇报,军区立即批准这一计划,并调集十八旅五十二团、江都独立团、三分区特务五团、一分区特务营等部划归刘飞统一指挥。

刘飞随即带领侦察人员勘察,发现三垛镇至河口镇之间有有条东西走向的公路,5公里内没有树木遮蔽,路北是泥泞的水田,路南是与公路平行的北澄子河,视野开阔,且这里位于兴化、高邮的中间地带,与两城相距40里,不利于敌人增援。于是,刘飞决定把伏击地点设在三垛镇以东、北澄子河边新庄到野徐庄一线约3.5千米



王平在朝鲜

王平在阜平工作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通过发动群众,组织起数千人的抗日力量,为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付出了大量心血,也使阜平这个偏僻小县很快发展为晋察冀边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11月中旬,王平奉命组建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随后离开阜平。在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和冀中军区政委期间,通过团结、争取、收编和改造民间抗日武装,为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了十几个团的兵力,其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

发起政治攻势,促成和平解放大同

解放战争时期,王平多次参与指挥了重大战役,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1948年11月底,时任解放军北岳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王平率所属一个步兵旅、骑兵第一师和独立四团迅速开赴大同城郊,与雁北军分区两个步兵团和浑源县支队共万余人将大同城围困起来。此时,山西北部雁北13县全部解放,只剩大同一座孤城。国民党大同城防司令长官于镇河根据阎锡山的命令,以大同为据点,继续负隅顽抗。在此次战斗中,王平经过认真调查研究,针对守敌兵力、装备处于优势的情况,在指挥部队坚决打击企图突围之敌的同时,决定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士气。

1948年11月底和12月初,王平主持召开两次会议,作出决策:以政治攻势为主,政治、军事、城(敌)工三管齐下,相互配合,迫敌就范,和平解放大同。

方针确定后,王平组织围城军民散发传单,用大同方言向守敌广播喊话,进一步瓦解敌人的士气。同时,

还广泛发动群众做大同守敌军政人员和城内居民亲朋故旧的思想工作,开展“写一封信、探一次亲、捎一句话”的“三一”活动。

1949年1月7日至2月7日,围城军民再一次掀起强大的政治攻势。春节将临,围城军民向守城敌军大力宣传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胜利,宣传解放区人民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阐述解放军优待俘虏的一贯政策,并动员敌军眷属在城下对话,有的还把过年的食物用绳索吊上城去。顿时,敌军官兵军心更加涣散,思乡、思亲、思降和不满上层的气氛日益加剧,此后不久,就有580余人的国民党守军向解放军投诚。

王平还指示部队,把在三十里铺战斗中被俘获的敌副团长释放回去,让他给大同守敌军官带信,劝其出城和谈。数日后,又将全部战俘释放回城。这些俘虏回到城中,向守军讲述了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进一步瓦解了守敌的斗志。4月初,大同国民党军官兵出城与解放军围城部队正式接触,王平等接见了他们,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25日,解放军各部相继向大同集结。国民党守军将官见状,只得表示愿意放下武器,走和平解放大同的道路,并向王平递交了亲笔信。4月29日中午12时,于镇河、孟祥社、田尚志以及随从、马弁共10余人,分乘几辆小汽车赴西坟村与围城解放军正式谈判,王平司令员委派察哈尔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及赵汉、叶修直、杨正等为谈判全权代表。5月1日,国民党守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大同宣告和平解放。

“坚决打,争取停”

1953年5月,王平奉命到志愿军二十兵团任政委,与司令员杨勇

一起组织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金城反击战。王平到任后,立即着手了解部队的政治工作情况。王平感到部队中有的口号提得不够妥当,就与有关领导交换意见,统一了认识,向部队发出了纠正的通知。经兵团党委研究确定,以“坚决打,争取停”的指导思想来统一全兵团的行动,让部队明确战斗的胜败直接影响谈判桌上美方的态度和我方代表“说话的分量”。

金城反击战第一阶段作战主要攻占敌前沿的支撑点,以歼灭敌人连以下目标为主。王平在组织部队战斗时,发现个别部队采用“抓一把”的战术,即派突击队突袭消灭敌人的据点后马上撤退。王平认为,这样的战斗固然可以消灭一些敌人,但据点有可能很快被敌人重新修复,继续成为威胁志愿军前进的“钉子”,而突击队回撤途中也容易遭敌炮火攻击。对此,王平当即与司令员杨勇进行了研究,并确定:突击队打下敌人的据点后必须坚守,等待后续部队到来巩固阵地。如敌人发起反扑,就坚决将其消灭。这一战术在部队推广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经过几个回合的争夺,金城反击战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告终。此役,志愿军与敌人激战14昼夜,歼敌5.3万余人,重创敌人4个师,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把战线向南推进了3至6公里,为促使朝鲜停战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战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参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志愿军指战员向世界展示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凝聚力、战斗力。当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在王平的组织下,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嘹亮的志愿军战歌随即响起,广大志愿军政工人员和文艺战士用此种方式,对前方的指战员表示祝贺。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石市档案馆)

日军见状,跑到河边准备下水救援,两脚陷入河床的淤泥,也成了南岸新四军的活靶子。

见敌人队形被打乱,刘飞命令各伏击部队发起冲锋,位于北澄子河南的新四军也渡河冲上公路,迅速把公路上的日伪军截成数段分割包围起来。在“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被围伪军在副团长的带领下纷纷缴械投降,公路东段的战斗仅用一个半小时就基本结束。

殿后的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营发现向西逃向高邮的路被新四军特务营切断,便仓皇向新庄跑去,企图凭借房屋固守待援。五十二团迅速组织力量冲入敌人阵地,和敌人展开巷战,把残敌逐步压缩到村子的南部。随后,新四军各部相继赶到新庄,向残敌猛攻,歼敌大半,日军只剩30余人。天黑后,敌人援军相继赶到,鉴于伏击战的目的已经达成,为保持主动,新四军除以部分兵力继续攻击、监视新庄内的残敌外,大部分参战部队在打扫战场后撤出战场。三垛河口伏击战至此胜利结束。

三垛河口伏击战是新四军苏中地区继车桥战役后的又一次大捷。据统计,此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共歼日伪军1800多人,其中毙日伪军240多人,伪军600多人,俘虏日军7人、伪军团长马佑铭以下伪军958人,缴获曲射炮两门、掷弹筒及小炮12门、轻重机枪24挺、步枪1166支、短枪48支,子弹5万余发,电台3部。战后,新四军军部对参战指战员进行了通令嘉奖。

赣东北红军首次缴获重机枪

况建军

1935年6月,方志敏在狱中所写下了《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一文其中写道:“我们的红军,继续打了些胜仗。尤以贵溪周坊之战,消灭了敌军一个整连,第一次缴获了敌人一架重机枪。大家都很高兴,军委会主席邵式平同志看到送机关枪来,乐得在地上打滚。”这里所说的“贵溪周坊之战”,指的就是名震赣东北的关王殿大捷。

1929年6月6日,江西省贵溪县周坊暴动揭开了贵(溪)、余(江)、万(年)暴动的序幕,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的指导下,8月暴动成功的贵溪县北部乡村革命群众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贵溪县苏维埃政府,开辟出赣东北一块新的革命根据地。

贵溪苏区的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派出正规军联合贵、余、万地方靖卫团等对贵溪苏区进行“围剿”。1929年9月,国民党第十八师兼岳旅依仗优势兵力进犯,企图通过军事镇压手段将贵溪苏区扼杀于初创之时,其所属张克丕部孤军深入,占据贵溪苏区中心所在地周坊村,驻扎于村东的关王殿,疯狂展开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群众的“进剿”。在此危急关头,方志敏临危受命兼任中共贵溪县委书记,组织赣东北红军和贵溪苏区干部群众开展反击国民党军“进剿”的斗争。



谢振华“掏心战术”显威力

刘晓可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起解放上海战役。战斗打响前,三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依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决心首先兵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向上海守敌侧后实施迂回作战,迂回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再围攻市区,分割歼守军。

遵照三野首长和兵团首长的指示,作为迂回作战的第一梯队,解放军三十军在军长谢振华、政委李干辉的率领下,于5月13日下午4时,由平湖出发,沿公路、海堤向川沙、白龙港地区急进。

时值梅雨季节,道路泥泞,部队行进艰难。谢振华立即弃马步行,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部队指战员不顾疲劳,奋力行军200多里,沿途消灭抵抗的国民党部队,终于比野战军司令部规定的期限提前一天赶到川沙以南的江家路镇。

谢振华不顾劳累,迅速察看地形,部署作战。他从战俘口中得知,国民党五十一军已于前三天进驻川沙、白龙港地区,现正忙于修筑工事,企图做长期抵抗准备。此时的川沙城里驻有千余人的国民党军和地方土顽部队。谢振华当即决定,趁川沙守敌立足未稳之机发起进攻。随后命令八十九师先头部队二六五团直扑川沙。守敌猝不及防,被歼700余人,余部放弃川沙县城仓皇逃走。

攻克川沙县城后,谢振华命令八十八师派出两个团,冒雨急行军,向北迂回,插入敌后,拿下顾家路镇,截断敌五十一军和其他守敌的联系。与此同时,

10月26日,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出其不意地向驻贵溪周坊关王殿的张克丕部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张克丕部一面以壕坑为掩护负隅顽抗,一面向周边敌人求援。为了阻止红军夹击,张克丕命令参加“进剿”的余江靖卫团去守后面的一座俯临壕坑的小山。赣东北红军独立第一团派出一个连冲上小山,余江靖卫团团丁们见势不妙,顿时做鸟兽散,红军占领小山后立即居高临下向壕坑里的张克丕部猛射,打得敌人顿时大乱。与此同时,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其他连队乘势从四面冲向敌人阵地,将敌人包围。张克丕负重伤后扔下部下化装逃走,其部下被全歼。这一战是赣东北红军建立后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缴获步枪67支,并首次缴获1挺重机关枪和4箱机枪子弹。

关王殿战斗的胜利,不仅巩固了已建立起来的贵溪苏区,而且开辟出30余村的暴动新区,同时有力支援了余江、万年农民暴动的开展,为贵、余、万暴动的最终胜利乃至“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方志敏烈士所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所说:“周坊的胜利,更加使群众高兴,斗争更加勇敢;贵溪苏区,就很快发展出去,贵城之外,都成了苏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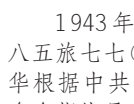
时,谢振华集结五个团的兵力,向当面之敌国民党五十一军立即发起进攻。战斗至夜12时,将敌五十一军主力及暂编第八师压缩在东西4公里、南北5公里的狭窄区域。由于天降暴雨,三十军的重武器没能迅速抵达前线。敌人发觉后,立即拼凑了三个团,在重炮的掩护下进行反扑,企图突破解放军的包围,与周边部队重新连接。

解放军二六三团与敌激战至天明,打垮了敌人三个团的反扑。谢振华根据敌情的变化立即调整部署,军炮兵团克服了河川及道路泥泞的困难及时赶到前线。当晚7时,谢振华指挥三十军发起总攻。各团连续突破敌人阵地,拿下清墩镇、林家码头,更采取“掏心战术”,直扑敌军所在地白龙港,只用一个多小时就攻克了敌军部,俘虏了敌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及其军部全体人员和一个小山炮团,彻底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同时把残敌分割成两块包围起来。为了集中火力杀伤敌人,谢振华命令把军炮兵团和从敌人山炮团缴获的18门火炮放在一起,向敌人猛轰。战至17日拂晓,解放军完全摧毁了该地残敌的抵抗,俘敌8000余人。

三十军攻下白龙港,截断了上海守敌经白龙港向海上逃退的退路。紧接着,在三十一军协同下,三十军发起了围歼高桥守敌的战斗。攻占高桥后,谢振华指挥三十军继续向黄浦江口追击,配合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完成对整个上海的全面合围,紧接着配合兄弟部队发起总攻。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七七〇团垦荒大风川

刘志洲



1943年4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团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率领1100多名指战员,进驻华池县大风川、小凤川,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开荒屯田活动。

早在1940年冬,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就亲赴大风川勘察地形,准备开展开荒屯垦活动。旅部先在大风川设立了拓荒生产处,1941年春,调七七〇团1个连队开展试验性小范围的屯垦活动。1943年春,七七〇团全体指战员先后奉命开往大风川开荒屯田。

七七〇团初到大风川,指战员们的生活非常艰辛,他们挖野菜、打野鸭蛋过荒;搭草棚、挖窑洞驻扎宿营;剥榆树皮编草鞋;用废铁打制工具,接着掀起热火朝天的开荒种地竞赛高潮。他们每天早晨鸡鸣二遍就上工,晚上点灯时天才收工,平均每天挖地12个多小时左右,每人每天平均挖3亩多荒地。八连连长刘海清创造出每天挖地4.8亩的成绩,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七七〇团指战员还利用凤川水源充足、水质好的有利条件,种出了陇东少有的水稻。

第一年春天,七七〇团共挖地两万多亩,并且种上了玉米、糜子、谷子、豆类、洋芋及荞麦等庄稼,打粮一万多斤。夏忙、秋忙过后,又开始盖房挖

窑,仅半年时间,就盖房360多间,挖窑洞100多孔。当年就基本解决了全团的食宿问题。团部领导为了改善指战员的生活水平和条件,开展饲养、采集、挖药、剥漆、酿酒、纺织等各种副业生产;建起了供给部、卫生所、澡堂、俱乐部等。在七七〇团的努力下,昔日的“野山僻壤、林木参天、人烟无几、兽群横行”的荒凉之地,迅速变成了“粮食仓满、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革命家务日趋巩固”的“鱼米之乡”。大风川冬季非常寒冷,为了解决指战员的取暖问题,七七〇团还分批组织人员烧木炭。

秋忙结束后,除了盖房挖窑的时间,部队还搞了大约5个月的军事训练,主要内容是跑操、扔手榴弹、射击、匍匐前进等演习。做到了农忙生产,农闲训练,培养实力,军民结合。

1944年11月,七七〇团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离开华池县大风川,在延安集结,整编后向陕西嵩山地区出征,奔赴抗日前线。在两年10个月的时间里,全团开荒3.4万亩,生产粮食数千石,不但改变了部队的生活条件,还把多余的粮食送到延安,有力地支援了边区建设和抗日前线,并大大减轻了陇东分区群众的负担。